

瀋陽文史研究

1988

沈 阳 文 史 研 究

第 三 辑

一九八八年七月

繼



往

開

來

爲館刊題字

戊辰夏暑 公鑒 沈正毅



· 本刊评论 ·

敬老崇文万岁

——热烈庆贺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圆满成功

林霁川 李维纯

我们以极其欣幸的心情，热烈庆贺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于六月中旬在首都中南海圆满结束。

令人振奋的是：自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年翘盼全国文史馆代表能够集会一堂，共商发扬民族文化之盛事。这一愿望，终于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导下，今年六月十四日至十九日由国务院和中央统战部联合主持下，实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夙愿。奠定了新时期振兴文史研究事业的里程碑。

更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有所争议的文史馆的前途问题，已在中南海的会议席上拍板定案。并将行文，昭告天下：文史研究馆是团结和安置部分年高德劭，有文史专长的非党耆宿，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事业单位。“文史馆也可以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摘自阎明虹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会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加强了对文史馆的领导，真正把文史馆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敬老崇文”重新得到会议的大力提倡。“敬老崇文”历来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解放后建立的文史研究馆即是本着“敬老崇文”的宗旨的。虽然，我市文史研究馆在历史上也走过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十年动乱也同样遭到解散的厄运。馆长沈延毅老先生及一些老馆员历经劫难；大量文物，典籍被毁，损失殆尽。但三中全会春风骀荡，我馆始得重开新运。今天，退老犹健、耆年硕学之士，欣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扬“敬老崇文”传统的新时期，必将为发扬民族文化甘献余热。

温故而知新。历史的反思，会使我们在新的形势面前，汲取教训振奋前进。

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建馆三十二年的历程，确是“几曾经雨复经霜”。五十年代，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我市文史馆应运而生。那时是对“文、老、贫”的老年知识分子出于养老救济的目的，聘了近三十名馆员。然而，十年浩劫中相继谢世。直至一九八四年经过多方求贤，重新选聘了二十余位具有文史专长的非党老年知识分子为馆员，重振雅韵，再倡斯文。在沈延毅馆长“独立思考、集体研究”的倡议下，分成文学、历史、艺术三组。晤言一堂，集思广益，摘文修史，赋诗作画，呈现一时之盛。至

今馆内已收集馆员之旧作和新篇达数百件之多。几年来排除了多种干扰，历尽艰辛，将馆员请老的文史专论数十万言，以及诗词佳作，先后出刊《沈阳文史研究》一、二、三辑，并成立嘤鸣诗社，收集馆员诗词近五百首，出版诗词专刊第一辑。刊物一经奉献社会，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赞誉。馆员请老感奋之余，无不庆幸欣逢改革盛世，犹可驰骋暮年，为四化尽燃余热。

今天，欢庆全国文史馆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之际，回想我们走过的道路，可以欣慰的是，没有辜负党与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在财力拮据，主观客观诸多干扰的情况下，对馆员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尚不能完全解决，而馆员请老犹自昼夜伏案，刻苦钻研挥毫著述，着实令人感佩。在文史研究方面，积三十余年的经验，近年来的实践，深知欲为宏扬民族文化，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文史研究课题首先必须具有地方特色，拾遗补缺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受聘馆员也必须各具文史专长，以其渊博学识，精湛艺术奉献于社会。

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重新认识全国文史研究馆座谈会上所拟定的方针和任务，更加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殊堪告慰的是，我们的路子尚能符合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的。也同时证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会议之前确实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今后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开拓新的局面，创建新的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指导。这首次召开的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本身，就已经实现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要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的要求，为我们的前进路上洒满了阳光。

这次隆重的会议，使我们既感到鼓舞，也受到了鞭策。随着我们的国家进入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新时期，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会议明确认定：文史研究馆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安置和团结部分有文史专长的党外老年知识分子的机构，是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研究事业单位。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我国的基本国情，文史研究馆同样要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今后的岁月中，主要是吸收党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台湾、港澳、海外回归的爱国的代表人物。（按：本刊发表的美籍华人陈学霖教授，从大洋彼岸惠寄本刊一篇介绍我国《金宋的茶叶贸易》的史学论文，这事实即足以说明海外硕学名士，关心祖国文化历史的一片热忱。）使他们老：有所归，安度晚年，藉以广泛团结党外人士，壮大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会议还强调提出就是在祖国统一以后，文史馆作为一个特殊的统战阵地，吸收一些台湾和港澳人士，仍然可以成为协调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地区之间的友谊的一条渠道。

这就是会议给予文史馆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也即是文史馆所具有的统战性。

会议明确提出了文史研究馆具有的荣誉性。会议强调馆员既是一些曾经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并将继续为社会贡献余热的专家、学者，理所当然受到社会的尊重，无愧于承应这种荣誉。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均由政府首长聘任，并且在这次隆重大会上把这种荣誉称谓公之于全社会，对于馆员来说，真是殊荣加身，更将激发起馆员献余生于祖国和人民的热忱。

其实，我国在五十年代初设立文史研究馆时，即已确定了这一富有荣誉内涵的“敬

崇老文”为其宗旨，而“敬老崇文”作为一种优良传统早已在二千多年前就为中华民族所提倡所发扬。早在秦汉时，即设立“三老五更”辅掌教化；历代帝王也尝以“父兄之礼养之”；《汉书》上更有“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之载；起唐宋以迄康乾之世，率皆科制博学宏词，考拔渊博能文之士。这些举措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今天我们的文史研究馆，不同于历史上的设馆纳贤，繁衍斯文。因为我们的馆员被聘任之前，既曾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退出工作岗位受聘为馆员之后，继续发挥其专长，为丰富我国文化宝库，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此外，德高望重的老年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为荣誉的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们将无保留地以渊博的知识培育下一代，还将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熏陶下一代，最后终将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素质和人民品德素质的提高。

这些就是文史研究馆及其馆员请老，所要承受的光荣任务和多方面意义的荣誉。那么，在当前一派生机勃勃的新形势下，我文史研究馆将有何所为？将有何所事事？

首先，为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必须涉及文史方面众多门类。为此就要延聘各有专攻的专家学者，诸如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曲艺戏剧、医药建筑……这些部门无不华夏文明竟放出异彩。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时至今日，我馆仅有馆员十多位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之需。为此，我们完全拥护会议所确定的：从第一线退下来的老年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造诣颇深，并有著作和作品的人士中延聘一批。我们相信馆员们将对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珍贵史料、艺术作品，能做到及时搜集、整理和收藏，使吉光片羽也不至湮灭。馆员还将继续研究文史方面的课题，创作新的艺术作品，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预计，在一批新馆员受聘后，将加强与社科部门、大专院校的对口协作，共同开创社会主义文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同时也将为发展中小学校课外教育，以及社会文化活动的，多方发挥馆员专长。

其次，应加强文史研究馆办事机构的建设和改革，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以高水平高效率的工作作风，树立真心实意地为馆员服务的思想。这是保证搞好文史研究馆日常业务的大事，对于我市文史研究馆来说，也是十分迫切的。除此而外，便是经费问题。在开展文史研究活动，编辑、出版刊物，举办书画展览，进行考古、参观学习等项正常业务以及开展统战工作等方面是需要花些钱的。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和我们工作的社会效益，给予解决经费问题。

当然，开展文史研究业务，还必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因人而异，各展所长。

这次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为文史馆开展文史研究工作打开新的局面，也为“敬老崇文”这个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唱了赞歌。让我们纵情高呼“敬老崇文”万岁！

目 录

·本刊评论·敬老崇文万岁·····林霁川 李维纯 (1—3)

诗 书 画 研 究

- 当代诗词现状的环顾·····张秀材 (1—13)
- 现代汉语诗韵新编·····王 曾 (14—39)
- 浅谈北方古代东胡族系各族诗歌·····白友寒 (31—38)
- 沈延毅先生书法艺术初探·····梅钟岩 (39—43)
- 临池漫议·····冯月庵 (44—51)
- 万般红紫见功真·····朱朴存 (52—56)
- 画到生时是熟时·····何 巨 (57—59)

文 史 钩 沉

- 试论中国古代是等级社会不存在奴隶制度·····王 曾 (60—74)
- 金宋的茶叶贸易·····陈学霖著 华涛译 陆得芝校 (75—86)
- 清入关后的民族对策·····金振古 (87—92)
- 清朝甲兵之本——八旗制·····金振古 (93—96)
- 魏燮均的墨迹及他的诗作特点·····孙 孚 (97—103)
- 《苏武牧羊》歌词确为蒋荫棠所作·····郁其文 (104—106)
- 契丹人在金代的政绩和地位·····冯继钦 (107—118)
- 论中国东北近代史研究主要问题·····西村成雄著 王维范译介 (119—133)

嚶 鸣 诗 社 作 品 选

- 沈延毅十六首····· (1—4)
- 张秀材十五首····· (4—7)
- 佟雪石十一首····· (8—9)
- 冯月庵四首····· (9)
- 黄禹篇五十首····· (10—21)
- 王维范四首····· (21—22)
- 王 曾五首····· (23—24)
- 李维纯一首····· (24)
- 张鸿翼一首····· (24)

当代诗词现状的环顾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
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梅尧臣

张秀材

自从“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一开始，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学形式——格律诗词，一下子被列为反应的封建妖孽堆中去了！“五四”的思想解放，是从几千年顽强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下摆脱出来，对旧思想的猛烈冲击，给新思想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当时提倡民主与科学，普遍开展新文化运动，这对后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其积极的意义和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在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却严重地违反了哲学中一个有名的理论——扬弃，给孩子洗澡之后，连同孩子一起泼出洗澡水么？当然不能。哲学家提出来“扬弃”，即奥伏赫变，是包含抛弃、保留、发扬和提高的意思。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和继承以往发展中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并把它发展到新的阶段。“五四”运动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竟然大喊反对旧文学。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文学，其构成的主要因素是内容和形式，二者既相依为命，又互相矛盾。内容是通过形式表达的，也就是说形式是表达内容的工具。形式可以表达好的内容，也可以表达坏的内容。也就是说无论好内容坏内容都必须通过形式来表达。而形式也有好坏之别，有时内容虽好

但用以表达的形式不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缺乏艺术性；有时内容既好，用以表达的形式也好，这叫做完美的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至于坏内容竟用好形式来表达，那便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们对文学不论旧与新，当然要反对坏内容和不好的形式，但决不应该因内容的不好，而反对经过漫长岁月历经多少人的探索、实践形成的完美艺术形式。正如《芳草》月刊编辑部主任洪源同志在1986年第2期的《东坡赤壁诗词》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五四时期，旧诗词受到了挑战……批的应该只是它的封建性内容，可是当时连形式也全部否定了，就象一个旧瓶子，本来只要倒掉里面的脏水就行了，可是当时有些人却非要把这瓶子砸碎不可”。洪源同志比拟的很形象，五四当时，的确如此。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旧文学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旧诗的形式，是与时代不适应的，要以新的形式来取代，想要让这悠久的艺术形式一下子消失，于是急切地采取了武断的处置，宣告旧诗“死亡”！

实际究竟怎样？回忆起来，亦颇令人哭笑不得！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名闯将们，一方面大喊：“提倡新诗，打破旧诗”的口号，一方面却不断地创作旧体诗，真是匪夷所思，自相矛盾！如刘半农

的《扬鞭集》收诗一百一十二首，而旧诗也占了二十一首，其中的“一曲横河水，风定波光静。泛泛双白鹅，荡碎垂杨影。”亦自清新可读，赵景深认为可与宋张子野相媲美。刘大白的《旧诗新话》中，收有他的旧诗三十余首，如其中的《卖布谣》、《爆竹》等诗，堪称上乘之作，在“打破旧诗”的浪中，竟流传很广。尤其是那咏爆竹的八首绝句，内容和形式俱臻完美之境。如其中之一首：“胸际层层蕴毒深，逼人声势骤消沉。青云未上身先裂，应悔包藏有祸心。”寓意极深。至于积极倡导“五四”运动的李大钊，则多以旧诗寄托其忧国感时之心，如《登楼杂感》云：“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此诗冠于其诗集《筑声剑影楼剩稿》之首，其慷慨激昂之情，跃然纸上。其他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名流如沈尹默、鲁迅等人，一方面反对文言文，一方面又大作文言文的作品，有文也有诗。例如鲁迅，他不但在“五四”前后写下了不少格律诗（《鲁迅全集》中收有61首，而新诗只有12首），那本从“五四”第二年开始著作并作为讲义的《中国小说史略》，洋洋近十五万言，则全是文言到底。又如那位抨击封建文化最激进的吴虞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后，照样作旧诗，连悼亡诗都是五言古风。

而“五四”以来的一些革命烈士，他们生前和就义时，留下了不少壮烈的诗篇，竟都是用格律诗的形式。

至于一些政治活动家，终生从事革命事业，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每欲抒怀记事，也愿用旧的诗词形式，写出了不少好

作品，如毛泽东、陈毅、朱德、董必武、叶剑英、瞿秋白、陶铸等同志，还未听说他们有谁写过新诗。

当新文学倡导起来之后，用白话文从事创作的小说家，如茅盾、叶圣陶、王统照、老舍、郁达夫、萧军等人，不写诗则已，写则必是格律诗。而一些以写新诗著称的，如郭沫若、闻一多、臧克家、郭小川、邵燕祥等人，后来大都少写、不写新诗而写起格律诗来了。闻一多居然声明：

“勒马回缰作旧诗”。臧克家则表示：“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楼栖以《不薄新诗爱旧诗》为题，著文表示对诗歌发展的看法和主张，是针对有人断言“新诗最终一定战胜旧诗”这一论点而言的。郭小川、邵燕祥等人所写的格律诗，远比他们的新诗更脍炙人口。邵燕祥还主张“自由诗”和“旧体诗”“并存共荣，百花齐放”。

于此可见，“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和以后，对旧体诗词（不管其内容和形式）的确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这生命力顽强的旧体诗词形式，连反对者也未能与它绝缘，一面反对，一面运用它者有之、先是弃而不用，最后则是破镜重圆者亦大有人在。

然而也应看到：自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旧体诗词形式千百年间多少人用它来写作，生产了无数的称得是艺术珍品的篇章。“运动家”们既想要以新的形式来取代它，一些权威人士则不主张提倡这种诗歌形式的继续沿用，于是从前那种诗人词家一有佳作，迅速争相传抄，不胫而走，呈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消声敛迹了。而印刷术日益发达的近六七十年来，全国大小报刊杂志，不下千种，大都是坚决不登旧体诗词，个别的则在不屑于的心情

下不得下泽人而登，造成了旧体诗词创作的沉寂冷情的现象。这种现象持续了较长时间，但实际并非如一般人悲观地认为或幸灾乐祸地认为，旧体诗词的形式和运用者连同产品，都行将寿终正寝了，一些精于以这种传统形式来作诗填词者，仍然我行我素，以承先启后的精神来维系这茫茫坠绪，如知名的夏敬观、夏承焘、龙榆生等诗家词人，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之作。

不幸的是：在这旧体诗词创作的沉寂冷清的岁月里，几次较大的政治运动，把一些旧体诗词的写作者和爱好者，冲击得噤若寒蝉！在反右时，竟然有人感叹能写作旧体诗词的人日渐稀少时，顺口吟诵了王渔洋秋柳诗中的“扶荔宫中花事尽，灵和殿里背人稀”，便被诬为对现实不满，叫喊今不如昔了！于是参加到右派加冕的行列之中而去！特别是到了史无前例的那场风暴到来之后，写旧诗词的人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作品则全是毒草了！不过在那种艰难而又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地下却有不少宛如潜流般的好诗。正如陈永正同志在一篇题为《当代诗词的衰落》一文中，提到了：“……受到残酷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在牛栏中，在五七干校的小油灯下，俯首吟哦，抚时感事，运用诗词这一特殊的文体，抒发家国之愤、身世之悲，表现了强烈的抗争精神，……诗人们被当前发生的巨大的政治悲剧撼动了，他们在疑虑，在思索，在自责，尽管处处是罗网，每句诗都可以构成文字狱，诗人们还是豁出性命，投入自己全部内心本质力量去过行新的创造。……可惜的是，大量的有一定历史价值和较高审美水平的作品，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不少已失传了，到今天，还有些作者怕遭到非议而秘不示人，……”笔者曾注意了这一遗憾，近几

年来曾多方搜寻到一些这样的艰苦之作。据广州出版的一期《诗词》报上，刊载了江苏史新同志写的一篇短文，介绍廖沫沙同志在1967年的夏天，与吴晗一同被押往京西一个矿区去接受批斗，押回的路上，他做成了一首题为《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捉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他在逆境中仍以苦为乐，既嘲人又自嘲，这种嘲，其中含有多少悲愤与辛酸！又如我的莫逆诗友史鹏同志从长沙寄来的《文革诗词选》（载1986年12月第34期《嚶鸣集》），其中如：署名为菽园的《揪出来》：“反动文人黑秀才，谁教背地写诗来？以诗问罪何须析，投入牛棚去脱胎！”《批斗会》：“式效飞机惯折腰，耳光初试不轻饶。牌悬颈项宽三尺，好挡归途风雪飘。”署名为张俊超的《游行》一诗中有：“娇儿不解其中妙，笑指阿爷帽最高。”《中国当代诗词选》中收了浩劫期间的作品，迄今为止算是较多的了。如王季思（中山大学教授）于1974年藉选注《聊斋志异》，吟出“孤愤满腔何处诉？秋灯照见鬼擎旗！”公木（吉林大学副校长）于1969年以《无题》为题，写他遭迫害的情景：“其长其短杳无音，我欲以头撞帝阍。为问苍天可有限，复呼大地岂无心！假真真假假罗织，非是是非靠引伸。弹雨枪林穿过了，归来阶下作囚人。”叶元章（宁波大学副教授）于1967年写有以《狱中中秋》为题的“也曾对月发幽情，偷向吴刚诉不平。破巷残更风最厉，昏灯暗壁夜难明。须知怀璧原无罪，强欲出师终有名。大好头颅劫灰里，秋韩几处唤几声！”读之令人酸鼻！安徽省文联顾问刘夜峰于1968年在拘禁中过了他的四十九岁生日，吟出了这样的诗句：“得

失个人何足虑，万千愁绪为神州！”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李亚群，1972年受迫害在安宁河边劳动，一首七律的尾联是这样写的：“安宁河畔安宁未？抚犊呼雏待夜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员陈九思老诗人，在《壶中天》一词的开头，就叹惋着他作品已被焚烧：“平生诗卷付祖龙，一炬灰飞烟灭，也有呕心肠断句，回首都成陈迹。煮鹤焚琴，充薪覆瓿，眼底风轮急……”。山西大学老教授罗元贞以《鸬鹚天》写他受迫害时的情景“救国安民素志坚，出生入死记韶年。忽惊批斗来徒辈，谁料摧残至倒悬！频展转，不成眠，最难将息鸬鹚天。漫漫长夜何时旦？欲向街头问半仙！”南社女诗人陈家庆之女徐永端，现在是苏州大学的讲师，1968年她二十九岁的时候，由于所谓“反动日记”，被判刑十年。1970年她的六十七岁母亲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她在服刑劳改时，以两首《采茶谣》来写她当时的哀痛：“穿梭来往认旗枪，嫩绿娇黄寸许长。残月在天人在地，负笈归去晓风凉。”“春山寂寂雨丝丝，细采均匀意恐迟。耳畔忽闻慈母唤，如痴如梦立多时。”北影的剧作家高汉在狱中写的五律，后半有这样的铮铮诗句：“未尝负天下，无愧铁栏杆。借问临窗鸟，阳春何日还？”上海社科院的特约研究员富寿荪，在浩劫期间目睹举国若狂的情景，悲愤地写出：“青衫莫浣伤时泪，大药难医举国狂！”“浩劫惊呼从古少，神州忍见百年沉！”

象以上所举的浩劫期间作品，可以说血和泪凝成的，拨乱反正后，虽然这些作品逐渐得见天日，恐怕失传的随人而永逝的不在少数！我们所能看到的，恐怕是吉光片羽了！

1976年的清明节前前后后，天安门广

场忽然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篇，这些诗篇绝大多数是以旧体诗词的形式写成的。一时读者如山似海，诵者声泪俱下。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整理出版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一书中所收的诗共640首，新诗只是67首，其余计旧体诗389首，词184首。当时这些诗词经无数人当场抄写，后来冒着危险珍藏起来，有的埋于地下，有的埋在花盆里，有的融化在蜡烛中，有的藏在炉壁中，有的放在地板下，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这些诗词才重见天日，《天安门革命诗文选》所收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出版之后，立刻不胫而走，人人以能迅速获得这本书为最大欣慰，全国各地给出版单位来信达数千封之多。其中不但对这本书给以高度的评价，还觉得供不应求，认为是“战斗檄文”，“珍贵的历史资料”，认为这些诗词“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志气”，是“留给下一代的，值得永生学习和纪念的珍品”；还有的信中说：“它们的爱情强烈，是非鲜明，感情炽烈，富有文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有的读者来信中说到他展转借得一册诗抄后，“视若珍宝”，通宵达旦地抄写刻印。也有的读者说他在阅读时“激动得止不住泪水刷刷地流下来，落在书上。”这真是旷古未见的现象。为什么这些诗词能得到如此广泛、巨大、强烈和深刻的反响？答案只能是：这样诗词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正如童怀周在诗集的后记中说的：“它们来自火热的群众斗争，是当年天安门广场千百万革命群众为缅怀革命先烈，愤怒讨伐‘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的产物，字里行间，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它们情真意切，气贯长虹……”童怀周也指出：“尽管其

中有些诗词在艺术上还有待提高，但它们仍应被看作是最美好的、最真实的革命文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如此鲜明的人民性和如此强烈的战斗性的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比如在当时被“四人帮”列为一号“反革命案件”，并在报道时肆意歪曲篡改的所谓“反动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激起了多少人的共鸣！一句“扬眉剑出鞘”成了令人难忘的名句。哀悼周总理的诗，都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心灵之声。如：“故园风雨几经年，大厦撑持似拄天。心志光明同日月，功勋盖世重河山。倾城人哭哀声震，遍地花飞白雪翻。空有如涛伤痛泪，神鹰高逝永难还！”又如一首《浣溪沙》，哀悼周总理之余，尖锐地指出当时“四人帮”的鬼蜮伎俩，“哭别亲人泪未消，山精出洞变人妖，装腔作势调门高。有意重研擒鬼法，无心轻信狗皮膏，留神拭目认花招。”

最近，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谢冕同志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题目是：《“诗歌博物馆”及艺术生态》，其中有如下一段话：“自从‘五四’宣布旧诗的‘死亡’之后，旧诗并未死亡。数十年之后，那些古旧的诗词形式竟然借激烈的革命内容，而在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向民众普及和传播，是艺术形式不会轻易消亡的证实。”（见1988年4月16日《光明日报》）

天旋地转，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屡遭厄运而未死亡的旧体诗词形式，竟然被广大人民欣然地运用起来进行创作，其繁荣的态势几乎超过了新诗的前途处境。即以各地诗社的建立，真是如雨后春笋。据《光明日报》的最近消息（1988年5月24日第一版）：“目前全国已

成立地市以上诗词组织400多个。广大诗人词家意兴风发，述怀言志，抒桑榆未晚之愿，唱振兴祖国之歌，促进了中华诗词的繁荣。”据我所知，全国规模较大的诗社有东坡赤壁诗社（成立于1983年10月，我入社时是1984年7月，那时就已有社员近三百人了），洞庭诗社、渤海艺文社、桂海诗社、江南诗社、广州诗社、黄河诗社、春申诗社、岳麓诗社、长白山诗社、凤山诗社、梦碧词社、历山诗社……，笔者所在的辽宁省内已知的有：曙鸣诗社、夕照明诗社、辽海诗社、盛京诗社、千山诗社、闾山诗社、金牛山诗社等。至于学会或协会，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相继成立。去年端午节全国性的中华诗词学会在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及海外的诗人词家代表达四百多人，可谓一时之盛。至于海外，更是令人鼓舞，传统诗词爱好者，遍及世界各地，被誉为“大汉天声”。在国外，诗社、诗刊也不少。如泰国有泰华诗学社，新加坡有新声诗社，美国有四海诗社，日本有期刊《吟咏新风》，泰国报纸则辟有诗词专页。

至于乐于诗词写作和参与诗社活动的，既有学者、教授，又有党政干部、工人农民，又有离休、退休人员，充分体现了当代诗词创作较为广泛的群众性。

至于作品的面世，前已述及，自“五四”以来，不仅新文学报刊拒发旧体诗词，一般的报刊也拒登或偶而一登，直至今日，仍有相当数量的文学报刊不予登载，现代文学史上只字不提。近一个时期，情况有了好转，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报刊逐渐为当代诗词辟一小小疆地了，如《人民日报》的副刊《大地》、《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唯一的以发表新诗为主的《诗刊》，从创

刊以来即给旧体诗词留有发表的地块，不过有时摆荒。1977年以来各期则大量地刊登了一些旧体诗词，如1987年7月号就一次刊登了十九家的作品四十余首，编者并在刊头有如下的话：“中国古典诗词存在了两千多年，‘五四’以后新诗进行了革命，用自由体新诗代替了格律体旧诗。今天，自由体新诗已为世人所普遍采用和习惯，但是旧体诗是否能存在？它的生命力如何？如何发挥它真正的作用？本刊从去年就在思索这一问题。百花齐放，对哪一种样式都不应排斥。如此，年初我们就计划和一些旧体诗词刊物联合召开一次座谈会，终于如愿。这一期我们隆重推出会议侧记及有关文章，希读者注意。当然，旧体诗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创作本身，但是，给予一定呐喊助阵也是不可少的。”《诗刊》编者的话，我们读来感到很欣慰，其中提到“一些旧体诗词刊物”，是指近几年来全国各地随着当代诗词创作的空前活跃，因而发表的园地陆续出现，除了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和地方报刊对当代诗词陆续开禁，而且诗歌报刊和综合性文艺杂志，也为当代诗词逐渐增加篇幅。特别是专门发表当代诗词的报刊日渐其多，如已知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有广州的《当代诗词》、《诗词报》、《诗词集刊》，韶关的《韶音》，贵阳的《爱晚诗刊》，广西的《桂海诗刊》，湖南的《潇湘诗萃》、《岳麓诗声》，岳阳的《洞庭诗词》，江苏的《江海诗词》，吉林的《长白山诗词》，山东的《历山诗刊》，湖北的《东坡赤壁诗词》，河南的《黄河诗词》，南昌的《江西诗词》，合肥的《安徽吟坛》，盐城的《湖海诗词》，湘潭的《白石诗刊》，昆明的《金碧诗刊》，山西的《难老泉声》，……等等。

至于个人出诗集，多人合集，就无法统计了，全国各地恐怕不在少数。而已知的大型诗词选集，则有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诗词选》，收入四百多位诗词作家的近两千首诗词和散曲。据闻：北京作家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当代诗词选萃》，即将出版，计划出四集，约二百万字左右，堪称巨帙。还有预计今年十月间问世，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华诗词佳作精选》，是由兰州诗人唐伯康同志发起的，曾广泛地向海内外征稿，本头当也不小。

不过，当前还有一种令人怅然的现象，写作旧体诗词的人，在文学艺术界称不上诗人！一提诗人，当然是写新诗的。而各级作家协会也不吸收只写旧体诗词的人作为会员，除非是亦新亦旧的少数人得以入会，所谓作家，主要是新文学的写作者。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诗歌大奖赛，全是赛新诗，旧体诗词是没有参赛资格的。但这种现象丝毫也影响不了旧体诗词的繁荣。诗词组织遍及全国各地，诗词刊物直欲洛阳纸贵，诗人词家何止成千上万，而作品之多则浩如烟海，而且出现了很多堪称上乘之作的老树新花。如于1986年不幸逝世的聂绀弩同志，生前有《散宜生诗集》问世，其中佳作累累，意象既新，句法亦奇。正如周锡馥同志在中国韵文学会年会上说的：聂绀弩的诗“能在李杜苏黄外另辟蹊径，所用的新名词又谐协圆融，不露圭角。而其整体的思想境界和思辨深度，更非古人所能企及。总之，从内容到技巧，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有人读了聂诗不但称赞，还称之为“绀弩体”。如《悼胡风》七古：“精神界人非驺子，沦落坎珂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

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这首诗曾在1985年6月《人民日报》上发表过，读来令人深思。文化大革命期间，年逾花甲的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锄草、挑水、推磨、砍柴，……他都一一为诗以记之。试看他的《推磨》：“百事输人我老牛，惟余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

近似“绀弩体”的诗作，如马依群同志于1966年写的《祸乱》：“顷刻乾坤暗，丛林噪乱鸦，三人分两派，一案累千家。众庶难安席，大王多似麻。有人夸大好，浩劫遍中华。”牛栏之中，尚敢吟此，想见其风骨。

薛盟同志原是浙江一位中医，诗词俱佳。如他在1968年写的《戊申纪事》，是记他在浩劫期间的悲愤心情的：“入世情深转类痴，那堪微命托游丝。人生寥落何为者，天意沉沦实使之！忍向刀丛抛热泪，漫于灯畔写新诗。老夫自有拿云手，不畏狂澜没顶时。”

寇梦碧同志的词较其诗作更为清新可读，如《蝶恋花》：“翠袖天寒愁日暮。输与凡葩，曲曲雕栏护。一寸春光余几许，芳心自忍风和雨。本是倾城休再顾。展转思量，总被婊娟误。对镜妆成心更苦，蛾眉却恨无人妒。”这首词以少陵《佳人》之意境，写出作者甚于灵均、稼轩之遭遇，盖灵均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之叹惋，稼轩是直言“蛾眉曾有人妒”。梦碧同志则是“蛾眉却恨无人妒”，意思更深了一层，与昌黎“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的解嘲语有其相通处。至于词的风格直追碧山，置于《花外集》中

可以乱真。

李汝伦同志的诗词多具新意，绝不落他人窠臼。如《武侯祠杂咏》：“劳心空筑读书台，公辅终无后继才。独为武侯悲失策，未挥皮匠百千来”。幽默中别有新意。《秋日登高》：“炎威减退忆红羊，独上高台对莽苍。远韵谁家风送笛？好歌何事句留创？念年左氏春秋传，一代才人血泪场。焉得二三同调至，铜琶铁板啸清商”。慷慨悲歌，真是大声镗镗，发人深思。汝伦同志的诗中警句迭出，足以令人击赏不已，如他的《赠友》：“解掉囚衣梅老去，冰魂雪骨未凋零”。1971年作的《愁雨》诗中有：“迅雷哭送灯前雨，敲打诗行作铁鸣。”都是铮铮作响的可传之作。

林默涵同志在十年浩劫中，流放到江西丰城，有《题小照》诗，写他在赣江边与牛合影的感想：“炎凉历尽复何求，默坐烟郊对老牛。风雪十年罹浩劫，江流九派洗沉忧。岂无黄土埋忠骨，自有青山伴白头。远想隔江垂暮色，夕阳红破一天秋。”他既悲愤地吟出：“人说丰城藏剑地，青锋何日出尘埋？”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唱出：“喜听荒鸡鸣大野，擎天硕鼠泣危竿。”

荒芜同志于1979年写了三首题为《赠马寅初先生》的诗，其中一首是：“钳口幽居二十年，今朝声望上青天。当时叱咤人何在？鸭噪蛙鸣两悄然！”读来使人深思不已。

胡乔木同志于1965年秋写的《沁园春·杭州感事》：“穆穆秋山，巍巍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蓬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园飘香。雪裹棉铃，金甌稻浪，秋意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狂澜。天堂一向喧扬，哭今古云

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露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豪迈之气，若扑眉睫。“土偶”、“妖骸”当有所指。

洪源同志悼念爱迫害致死的刘绶松教授，写了极其沉痛的诗：“常忆书灯接哭音，南窗受学海教深。一腔热血催桃李，半席衷肠别死生。恨有良才遭毒手，愧无诗泪吊忠魂。伤心唯见长江水，怒卷苍穹吼不平！”读之令人酸鼻。

霍松林同志于劫后游黄州赤壁，写了一首《念奴娇》，用东坡韵，且在上片写东坡当年遭遇，下片则写他个人的感想：

“吾辈劫后登临，清平江阔，万櫓争先发。磨蝎休嗟曾照命，正道沧桑难灭。齿脱舌存，书焚笔在，一任添华发。惜分珍秒，莫辜新日新月。”抚摸伤痕之余，表达了开朗乐观的心怀。

臧克家这位老新诗人，晚年写了不少格律诗。《述怀》中有句云：“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吴淮生同志的和诗则是：“诗人何必叹台镜，霜叶春花一样红。”都很有新意。

刊登在《诗刊》上的吕千飞同志的《对镜》，与臧克家同志的这首《述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谁见仙家不老容？鬓丝难免变霜蓬。八千里远开荒客，二十年来打杂工。敲碎玻璃寻旧火，倒流岁月返顽童。从今莫作荒唐梦，白发何妨晚节红。”

有一位被人称之为“名噪鄂东久，雅号‘万金油’”的诗人，去年我在首都与他匆匆见了一面，后来他千里迢迢地寄来一本《栖凤楼吟稿》，中多情真意切之作。华钟彦教授誉之为：“可追踪聂绀弩，比肩李汝伦。”他的诗词特点是能从极平常的事

物中引出新意来，而语言朴实无华，绝无斧凿之痕。如他《咏牵牛花》：“向上频频吹喇叭，花蕾如盏敬谁家？长藤巧似尖尖手，紧抱篱笆得意爬！”《咏文凭》：“莫道轻飘纸一张，陡然涨价赛金帛。铺开可作青云路，披挂何输孔雀裘。知识纵虚随尔贵，才华虽富缺伊香。后门岂乏装演卖，快让灵魂十倍偿！”语近尖刺，盖纪实也。其《论诗》十首中有：“最爱西施淡雅妆，东施搽粉笑荒唐。好诗句似山泉滴，清水芙蓉自艳香。”正如其人。他就是湖北罗田的黄白丁。

王充闾同志的《写怀寄友》二首，写出了他的为人和抱负：“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情一样清。”语极清新，读之如见其人。

现在内蒙工作的孔庆瑛同志，允文允武，其《与治史诸君共勉》一诗，立言极是：

“旧录纷纭半失真，词臣屈节作谀臣！世衰尚有南狐笔，不信今人逊古人。”

《诗刊》上还登过熊楚剑的四首《西江月》，一咏文山，一咏会海，一咏参观热，一咏检查风。针砭时弊，可谓入木三分。这里索性都抄来看看：“多谢飞鸿作美，送来文件成山。衙斋闭户勇登攀，爬得浑身似汗。八股文章增值，王婆脚布翻番。文山何日削为滩，恨少愚公百万。”这是咏《文山》；“已惯长年开会，洋工大伙来磨。坐而论道念弥陀，大好时光混过。会海无边无际，矛盾越扯越多。文章讲话几皮箩，谁问耕耘收获。”这是咏《会海》；

“卷起参观热浪，人流车水奔忙。尘羁脱却走昂昂，个个心花怒放。绕道游山玩水，逛街走马观光。玩它三月也无妨，反正公家报帐。”这是咏《参观热》；“平日

高高在上，年终大搞检查。钦差巡按一车车，到处焚香接驾。频频佳肴美酒，人人有吃有拿。验收保证挂红花，管你是真是假。”这是咏《检查风》。这些现象能说是失实么？从写作技巧来看，这不都是绝妙好词么？

丁芒同志本是一位新诗人，可是他近几年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古体诗词和散曲，篇篇具有新意，这里且把他1987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南昌套曲·不伏老》介绍给大家：“《一枝花》啖人间一口饭，呷世上半杯酒。饥肠只要混饱，酒瘾并不肯求。鼯鼠临流，也不过满腹些些许，更不惯乱伸那非分手。半生来破帽遮头，却偏叫提襟见肘。《梁州》没奈何我是个吞书的领袖，吃纸的班头，况天生秉性总依旧，胸无寸甲，手缺吴钩，心方一窍，舌不涂油。捉老鸦要把树先钻，脚步儿踩着脚印儿走。将陋斋看做一带琼瑶，书架儿就是千叠翡翠楼。诗笺儿似万顷波光一犁收，你道我痴也暂休，又何曾拚夺功名首，尽你玲珑又剔透，我只自甘拜下风三叉手，躲进一统楼。《隔尾》却不道碰见躲不掉、避不开的灾星儿，把我害了个够。纵是个金剛体，不败身的老树瘤，经历些五关六将，挨过些明枪冷炮沸滚油，能不撞破头？偏不愿人到老年万事休，草草地虚度了春秋。《尾》我是个压不垮、打不死、斩不绝、劈不开的千年枸杞万年柳，一缕春风腹内揉，一握芬芳常独嗅。要说有愁，我也有愁，就怕这秃笔绘不尽河山秀。”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好了，不多征引了。当代诗词的繁荣现象，不可能在此一览无余。清代编的《全唐诗》汇集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作家达二千二百余人，得诗四万八千余首。而今天，远的不计算，单从1987年以来，直到

今年，全国诗社即有四百多，假设每个诗社有十人左右（其实最多的达数百人），则诗人不下四五千人，单干户还不知道有多少！作品之多，可以想见。我这里只提到十几位诗家词人的作品，不过略窥一斑耳。

当前诗词的作者和作品如是之多，读者又有多少呢？我们先从人们欣赏古典诗词作品的盛况空前来看看：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唐诗鉴赏辞典》，立刻风靡一时，三年的工夫，印行了一百一十万册。而唐宋词鉴赏性书籍的出版，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1986年12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唐宋词鉴赏辞典》，印行二十万册，这对渴望购到这部与《唐诗鉴赏辞典》姊妹篇的读者来说，自然是争相购买了。而《光明日报》先是刊登了一则两个出版单位为这部书的版权问题而争论起来的消息。最近则是刊登了一则以《〈唐宋词鉴赏辞典〉第一卷正式出版》为题的消息，说是“在成书过程中，研究、比较了已出版的同类同名鉴赏辞典，以求质量上精益求精。”并说“（唐·五代·北宋卷）已于最近正式出版；（南宋·辽·金卷）将于七月出版”。可见这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同名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一是一卷本，一是两卷本。中间经过了版权的争论，而前者即一卷本中收唐、五代、宋词人一百八十五家的词作六百九十七首；后者即二卷本则共收唐、五代、两宋、辽、金三百二十七位词人的词作一千五百一十八首，超过了一卷本的同类书一倍以上。这种带有竞争性的出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显而易见，几十年来被轻视乃至排斥之为“陈旧”的古典诗词艺术珍品，在当前我国这种百废俱兴的社会形态中，人们不论是社会科学工

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乃至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愿把它作为精神食粮。过去或多或少欣赏过这种艺术珍品的人们，渴望能有类似上述的唐诗宋词的专集、选集出版，他们有的从书店买来，如见故人，有的如获至宝。而一向欣赏最新鲜和最超前并被称之为先锋的新诗的人们，在被朦胧得享受不到审美的满足时，也想要从这种艺术珍品中一新耳目了。所以我们既看到：出版部门大量地出版古典诗词专集或选集以及赏析性的读物，而出现在争相购买供不应求的现象，也高兴地看到当代人所写的格律诗词也拥有大量的读者了，即以1983年出版的《洞庭诗选》为例，第一次印了一万八千册，很快就销售一空。

在这盛况空前的旧体诗词“复归期”，上面我们从各地报刊和专集、选集中，挑出一些质量较高的作品，做了介绍。但是，充斥在大大小小报刊上或专集、选集中的质量低劣及有乖于古典诗词格律的作品，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长此下去，作品的本身既很难赢得大量的读者，且不能传之久远，这不但是作者本身的悲剧；严重的是它影响着当代诗词的健康发展，也给一些初学诗词写作的青年们，树立了不好的榜样。而偏偏写这样作品的人们，却是“发表欲”非常旺盛，真是灾梨祸枣！还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写旧体诗词的人以及写新诗的人，当前仍有让人家看不懂的作品陆续出世。这种现象已经有不少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批评了。如戚克家同志由于有不少人给他去信，说是“近年来，许多诗实在看不懂，比谜语升高了十倍”，请他给解释一下。他以《写给谁看》为题，在1987年1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

“他们所看不懂的诗，我何尝看得懂！岂止我，好几位从事诗歌创作四五十年的老诗友，都同声慨叹，我们都成为诗盲了。”又如雁翼同志在1987年3月14日的《文艺报》上，以《诗人的价值在诗里》为题，现身说法地说道：“……别的诗人有多少种追求？我说不准，我自己许多种追求中有一种最基本的追求，那就是想出各种办法与读者沟通，想出各种办法不在自己的作品和读者之间构造壁垒——不使用读者不懂的词句，不使用让读者翻查字典的生字，不在语言文字结构上要花招。就是说象庄稼人一样老老实实作诗。……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手段让更多的读者看得懂，……尽量尽深地打动读者的感情，尽量尽深地启发读者的想象，尽量地被读者记住。我想，这种最基本的追求，凡是用语言文字记录、表现、塑造感情的人，都是为了读者看得懂愿意看的，否则，不是自己反对自己，自己给自己闹别扭吗！假如真有那么一个人，他写诗就是想方设法让读者看不懂，我想，那是对自己对诗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诗越写得使人看不懂越好，倘若写得连诗人自己也不懂，那诗的价值就更高。我认为这是小孩子的理论，而且，这小孩的年纪不会超过小学一年级，但又缺乏小孩子的纯真。……倘若一首诗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还能产生美学价值吗？只为个别美学专家写诗是可以的，但我不干，我不愿意自己反对自己，我是要为广大读者写诗的，……”雁翼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写新诗而言的，而我们一些写古体诗词的同志们，不也应该深思么？还有李维纯同志在1986年《沈阳文史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了题为《试论旧体诗的继承和发展》一文，其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他说：…语言通顺，平